

压,武汉的新军基本上就空虚了。革命党利用这样一个机会,一下子把清政府推翻了。武昌搞了个革命,章开沅先生说,这场革命也没死多少人,但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当时清军在武汉也没有很多人,革命党人起义,清军就跑了。当时武器也很落后,也不像现在这样有原子弹、导弹,所以死人并不多。但是武昌起义的意义非常重大。清政府将铁路收为国有政策的失误,得罪了民营资本家。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清政府要大量赔款,另外办新军也要钱,办学校也要钱,钱怎么弄来?增加税收。税收一多,就得罪老百姓了。城市的商人、小贩很有意见。商人、资本家也起来反对清政府了。所以到了清末的时候,政府政策的错误,造成整个社会的混乱,清政府想搞新政,派了一批人到外国考察,他们回来之后给政府递交了报告。但政府没有按照这些知识分子提供的办法来做,最后做什么?搞一个皇族内阁,就是满族贵族组成的一个内阁。那个内阁主要由满族贵族担任有国防、军事大权的重要位置,其他次要的职位给汉族人,给其他人。这么一弄,又把地方上广大的汉族官员,特别是各个省的总督、巡抚得罪了。所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不是一枪一响就把清政府推翻的。持续两百多年统治的清政府有几百万人的军队,但它守护不了清政府,为什么?人民不让其继续统治。

武昌起义后,湖南、湖北、广东,各省都和平“光复”了,真真正正能够跟革命党对着打的,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西安,一个是福州。别的地方都没有打,都和平“光复”了。所以清政府是垮于它自己。但是话又讲回来,如果没有孙中山的革命,造成了人民的觉醒,造成了清政府整个的危机,清政府也不可能那么快地倒。但是革命党人一发动反清,整个社会都动起来了,矛盾集中爆发,清政府就非垮不可。所以我说清政府一定要垮。有人说让清政府搞新政,自己改革,不要革命,中国发展会更好,我认为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我们作为研究者,要把当时的社会和矛盾搞清楚。只有搞清楚才能够反驳谬论,让大家知道真相。有学者说要把孙中山“从神坛上拉下来”,这是一种情绪,不是学术争论。我不同意他的看法,在我的书里也有批判他的,但是没有点名,我觉得用不着点名。点名也不好,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但有一个是非问题要搞清楚,我认为对孙中山的肯定不是造神,而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做研究就是要求真求实,根据各种材料,搞

清楚是怎么回事,加以正确解说,通过正确解说,给人以启示,去吸取前人在创造历史中的教训和经验。这样的研究才是研究历史。

人物的研究是比较复杂的。有些表面上的东西,从文本到文本不困难,文字上看不困难。但是研究人物的潜意识,这就很难了,这个是胡绳武先生生前跟我谈的,两个人谈了多次。他说研究孙中山,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孙中山潜在的意识不太容易理解。因为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干什么事情,他心里怎么想法,具体的东西,他不会讲。我跟胡先生说,你说他是好人,我说他是坏人,问题是什么标准说他是好人?比如蒋介石喜欢写日记,但他的日记肯定不会讲,我今天要罢谁的官,明天我又要搞掉谁。日记讲的都是冠冕堂皇的东西,说的都是生活的一点一滴,今天早上几点钟我去哪里了,谁又来了。其实很多东西,他内心怎么想你不知道。孙中山也是存在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他的故事,做事为什么这么做,不那样做,都有他的想法。但是这些想法,他不容易透露出来,也不会写在日记上,也不会写在文章里,更不会跟记者讲。现在我们研究孙中山,主要方法还是从文本到文本,从这个书到那个书,然后根据我们的理解,结合我们自己的体会作出解说。

所以研究问题,解说不清楚,解释不到位,现实意义就大打折扣。因此,我说研究人物要注意全面,不能片面。如果根据一条材料就解释,你可以这么讲,我可以那么讲。搞宣传,搞研究,绝对不能根据一个人的回忆或一个材料就下结论,这样下结论往往容易错。孙中山在广州三次建立政权,日理万机,你根据一条材料就说他今日只在大元帅府哪里也不去,这容易犯错。大元帅府开完会,他又去黄埔军校办事,为什么不可以?现在的领导都是一天走好几趟,先在这里,后又到那里,你说他只在那里,没有去别处,就是一条孤证,往往是不对的。所以,学会考证和诠释材料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三、孙中山宋庆龄的家国情怀

我们宣传孙中山、宋庆龄,宣传他们俩的爱国行为是非常重要的,不是可有可无的。我们应该把做这两个人的研究、宣传工作,作为我们伟大的使命,提高我们的工作意义。不是我们有什么了不起,而是弘扬民族英雄,弘扬爱国者,是历史使命,不是可有可无

的。做这个事,就不是一般来应付一下,而是历史的使命。所谓历史的使命,就是要对国家负责、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这是我们的责任担当,也是工作的态度,是重要的人品。

孙中山、宋庆龄两个人结婚。过去有人认为宋庆龄是崇拜英雄。崇拜英雄,她是有这个思想。但更重要的原因,我认为不是崇拜英雄。她同孙中山两个人结合的时候,是1915年。1915年是个什么年头?一是孙中山的哥哥、让他在檀香山读书的孙眉,3月在澳门去世了。孙眉为了他的革命,最后破产了,什么都没有了,回到澳门居住,后来病死。留下一个孩子,叫孙昌。孙中山自己原先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孙姪、孙婉,一个儿子孙科。孙姪1912年去世了。孙宋结婚时,有两个孩子,加上侄子孙昌,以及孙昌的两个儿子孙乾、孙满,这些人都要孙中山抚养和照顾。我讲他有家国情怀不是说他只爱国家,不爱他家里的亲人。1913年孙中山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凯通缉他,他不能回国,只能孤独待在日本。

孙中山后来为什么和宋庆龄结婚?宋的爸爸安排她去当孙中山的秘书。宋庆龄的确是有中国妇女优良的传统,对碰到困难的人很怜悯,她很关怀他人。但是,孙中山原来的夫人卢慕贞对孙中山很关怀,可她没办法陪他,她看到孙中山在外面老是一个人,没人照顾,便劝孙中山按照中国传统的办法,再找个二房,找个妾室。孙中山当然不干,他也是受外国教育的人,不能这样子。卢夫人通情达理,她9月只好去日本和孙中山办离婚手续,10月孙中山和宋庆龄结婚。

结了婚以后,两个人共同生活了9年半。这9年半是什么情况呢?我可以讲是宋庆龄一辈子最经受生命考验的9年半,也是她生活上最困难、最艰苦的9年半。宋庆龄为什么要同孙中山结婚?因为宋庆龄给孙中山当秘书,她同情孙中山,也了解孙中山的理想和对未来发展的计划。宋庆龄是爱国者,她同孙中山有共同的理想和使命。所以,宋庆龄不顾家人和孙中山的一些同事反对,决心同孙中山一起发动人民团结起来救国,振兴中华,复兴中国。宋庆龄跟着孙中山吃苦,而且不是一般的苦。陈炯明叛变的时候,宋庆龄差点儿连命都没有了。当时孙宋住在广州越秀楼,叛军的炮火对着他们,总统府离孙府住地不太远,但是就是到不了,非常危险。后来经过各种办法,宋庆龄在卫兵护卫下走到广州市沙面的英法租界,又不敢住在其他人的家里,只能住在一个电工的

家里。第二天早上,岭南大学的校长、同盟会的成员钟荣光派人开船到沙面把她接到岭南大学,然后上了永丰舰,见了孙中山。因为孙中山在指挥海军与叛军作战,在永丰舰不安全,海军部队找个军舰,把宋庆龄送到了香港,再转到了上海,那些天是非常危险的。

你们到广州大元帅府也可以看到,孙宋在那个地方生活,住的地方很小,还很困难。孙中山的儿子孙科、侄子孙昌,包括宋庆龄的大弟宋子文也回来了,一家子都在那个地方。孙中山、宋庆龄不但要考虑国家的大事,还得照顾他的家人,使每个人生活得好,生活得安定,所以我说他有家国情怀。这个非常重要。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就缺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要学孙中山宋庆龄,学什么东西? 要学他们的高贵品质,学他们建设国家的理想,学他们天下为公、关怀人类的道德,学他们的家国情怀。思想、道德、品质、理想、使命、价值观,则是永恒的宝贵精神财富。

我最近编了一本书,《从家国情怀到天下为公——孙中山的精神文明、文化遗产研究》,已经交付出版社了。我要宣传孙中山的精神文明,要弘扬孙中山的家国情怀、天下为公的文化遗产,就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当然大家在不同的单位,有的主要是作宣传,但宣传也要研究。我们是专业研究者,当然,我们的研究也是为了宣传,出书给大家看,让人民知道,应该怎么认识这个问题,启示了什么,这也是宣传。研究者主要是从学术的角度来研究。学术问题可以讨论,但涉及一些重大问题的争论,要解决好。如果解决不好,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全世界那么多人研究,看法不一。所以对孙中山要有一个正确的评价。江泽民讲孙中山是开辟我们伟大时代的第一个伟人。胡锦涛讲他是伟大的爱国者、民主革命的先驱。现在习近平总书记说孙中山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者、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中共中央这么评价孙中山,我们应该领会中央的精神,宣传孙中山就不应离开这个主流的方向。

四、如何研究和宣传孙中山宋庆龄

我们学术机构的研究主要是从学术的角度,研究应该怎么看孙中山和宋庆龄,怎么正确认识他们奋斗的一生,他们主要的精神是什么,我们要弘扬什么,要宣传他们什么。

这一点学术机构和文博单位不太一样,要把它区分开来。文博单位除了自己的工作,还要管理,如果跟我们一样,天天看材料搞研究也不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和那么大的精力。但是也要研究,如果不研究,没有鉴别的能力,对工作是有影响的。所以,文博单位的研究、任务、责任,跟我们不太一样,各个不同单位的研究目的,研究的角度、问题也不一样。这个是应该把握、注意的一个问题。另外做宣传工作,我们应该弘扬孙中山宋庆龄伟大的人格,他们以什么方法,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作了什么贡献,等等。从这个角度来看,从事宣传工作一定要有正确的思想,还要有智慧和才华。没有正确的思想和本事,宣传也做不好。

孙中山故居是上海的名片,全世界的人都要来参观和瞻仰,这就显得重要。更重要的事情是,要为国家作贡献,做好宣传,让参观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要学习孙中山的爱国爱民思想,实现复兴中华的中国梦。纪念馆的工作不仅有意义,而且意义非常重大。不要小看这份工作,不要认为是干普通的管理工作。绝对不是!如果能把宣传孙中山、宋庆龄的工作做好了,全国人民、党和政府都会感谢你们。

但是,宋庆龄跟孙中山两个人又不一样。孙中山是政治家,也是个思想家。但宋庆龄,可以讲她是政治家,因为她当过国家领导人,但是她不是一个思想家。她没有创造多少理论,不像孙中山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五权宪法》《三民主义》。宋庆龄做很多具体工作,她的来往信件很多,给这个写信,给那个写信。这些重要不重要?重要,但是这个不是系统的政治理论。宋庆龄有理想,也有思想,但她没有把它系统起来。所以,虽然人们拥护爱戴她,但她不能给人指出时代的特点和社会发展方向。治理国家只管做事是不行的。孙中山是思想家,按照他著作所写的做,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两个人,应该区分开来,不能要求宋庆龄跟孙中山一样。

所以,研究他们两个人,必须从他们的实质出发,不能把他们当一个人一样对待。两个都是伟人。宋庆龄先生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宋庆龄伟大在哪里?伟大就在,她不跟着腐败的国民党政府,不去当它的官,绝对不跟它勾结在一块。国民党政府动员她到南京当官,她坚决不去,跟他们划清了界限。然后干什么呢?她做了好多好事,比如营救爱国知识分子。抗战时八路军很困难的时候,她把药品,把各种要用的东西,通过各种办法,运到解放区去给部队。她干的这些事情也

非常重要。另外,她反对独裁政府,坚持和捍卫孙中山的思想。但是只强调她捍卫和守护孙中山的思想,我觉得也不够。她更关键做了什么?她为了建立新中国,为新中国奋斗,她担任国家领导人访问全世界。到哪里去开会,她都要讲世界和平;她到哪里都宣传人类要互相关怀,要和平、民主、平等、博爱;她到哪里都是通过她的朋友,通过她各种熟悉的人来宣传这些内容。她回到国内,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间去,到战士里面去,到妇女和民主人士中去,也是宣传,发动人民团结为新中国奋斗。她虽然很艰苦,但她立志为新中国忘我地工作。这就是宋庆龄的贡献,也是她为新中国奋斗的伟大精神。她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孙中山。她和孙中山在一起的几年生活是很艰苦的,但是为了国家,她没有后悔说不应该跟孙中山结婚和追随他革命。所以,她具有很高尚的人格。

宋庆龄去世之前,以她的地位,孙中山的夫人,可以名正言顺地埋在南京中山陵。她不愿意,她绝对不这样。她是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也可以埋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她也不去,就回老家,回上海,跟父母葬在一块,跟自己的保姆葬在一起,伟大不伟大?我说很伟大,这种人格不是一般的人能够有的。周总理讲她是“国之瑰宝”,她是我们优秀的妇女的代表,的确是这样的。爱泼斯坦先生对她的评价很高。因为他长期在宋庆龄身边工作,他很了解宋庆龄。所以,只要一个人对宋庆龄了解越多,对她的评价就越高。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要宣传,要研究,要老百姓了解真正的宋庆龄。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和我们的爱国者,跟我们的英雄人物联系在一起,他们之间只有了解才会心连心。所以,宣传工作非常重要。

再比如,过去学术界、政界对孙中山也是批评不少,批评他的民生史观,批评他的主观社会主义思想。为什么要批评孙中山呢?因为他不讲阶级斗争,不讲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是阶级斗争,他强调是人们为了自己生活得好,生活得幸福才努力工作,所以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是民生。这就是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台湾有位学者张益弘,写了一套三四本的论孙中山思想体系的书,民生主义就写了几百页。他讲民生主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强调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又说孙中山如何批判马克思的。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在同盟会成立100周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回顾与展望》,副标题是“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谈起”。我觉

得孙中山在民生主义演说中说的是对的。他讲人们就是为了生活好来工作,来创造财富,如果不是为了自己生活得好,他为什么会卖命来工作呢?这就是孙中山强调的人民的生计问题才是民生问题。孙中山在1924年制定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里,把民生主义排在第一条,民权主义排第二,民族主义排第三。他讲民生主义要干什么?民生就是要解决人们的生计问题,即生活的问题,让人民生活得好,要解决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问题。我们现在社会主义也还是通过解决人们的衣食住行的问题,来促进社会的发展。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不就是干这个事吗?邓小平讲发展是硬道理,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让国家富强起来。现在国家是富一点了,但也没有很富,国家也强一点了,但也还没有很强。但是我们要用功,还要奋斗。四十年来改革开放就是干这个事。孙中山《实业计划》里面讲引进外资来发展经济,发展我们国家,我们现在就干这个事,在干孙中山当年讲的事。

前不久刚去世的台湾政治大学蒋永敬先生2018年出了一本回忆录《九五独白》,他就把我那个民生主义的文章引用了很长,也介绍了一下,说像林家有这样一个年纪大的人,经过那么长时间的磨砺、锻炼,成熟多了。可见我说的话他也会接受,说我讲到点子上了,肯定了我。蒋先生是我的前辈学者,我与他是很好的朋友,我一去台湾,都要见他,他一来大陆参加学术研讨会,只要我在,我也会向他请教。但是很可惜,他96岁时去世了。我的意思是说,类似孙中山民生主义这类问题,一定要搞清楚,不搞清楚就乱批评,影响很大。

另外,孙中山的核心思想是什么?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过去包括我的老朋友张磊先生,都说三民主义就是他的核心思想,我说也不一定。南京大学的张宪文先生说博爱是他的核心思想,我说博爱也概括不了。我认为爱国、革命、建设才是孙中山的核心思想。他一生,因为爱这个国家,爱这个民族,所以爱革命。革命干什么呢?他说革命是为了破坏,但老破坏不行,所以不能老革命。革命是为了建设,就是要建设这个国家,把我们的国家建成独立、民主、富强的国家。

宋庆龄跟孙中山就不一样了。毫无疑问宋庆龄是爱国者,因为她爱国才爱孙中山,如果她不爱国,她也不爱孙中山。开始的时候,她是作为孙中山爱国革命的一个同情者、拥护者,后来慢慢成为伙伴和战友了,再后来孙中山逝世后,她则成为坚决捍卫孙中

山的思想,为实现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的斗士,也是我们女界的榜样。所以宋庆龄的确是很了不起的人!新中国成立以后,她是国家领导人。国家领导人看了很多文件,也批复了很多文件,我们现在不可能看到这些东西。如果要写完整的《宋庆龄传》,全面写就比较困难,不太好写。国家领导人每日看的文件,要签字,要批示,好多这样的东西,我们不可能知道,研究者既然不知道她怎么讲就不能随便讲。你讲了一些没有根据的话,一旦将来档案一公开,你全错了。所以,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这个要注意。

但是,谈到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这本文集,可以看出她的主流思想就是要把中国建成为一个民主的、共和的、繁荣的、富强的新中国。这个是她奋斗了一辈子的理想。

现在我们进入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相对旧时代来讲,对于孙中山革命后建立共和国的时代,它也是新时代。清政府以前封建君主专制的时代是旧的时代,共和民主也是个新时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是个新时代,到现在,又到我们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理想的新时代。所以说,复兴中华是你们这一代人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有很多东西可以做。过去你们也做了很多,尤其是你们出了很多宋庆龄的书信、回忆录,中国福利会也出版了好多宋庆龄的书。宋庆龄在中国福利会怎么做慈善,怎么办好学校,怎么办幼儿园,培养青少年一代,培养接班人,出了很多这样的书。这些对我们研究界很有帮助。但是,光是这样子也不能全面反映宋庆龄伟大的一生对国家所作的贡献。学术界虽然撰写了《宋庆龄年谱长编》《宋庆龄年谱》《宋庆龄传》及其他著作。但普通老百姓对宋庆龄还是不太了解。因此,出版一些宋庆龄普及性的著作,向老百姓、向青少年和人民宣传也非常必要。特别是宋庆龄研究会和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是研究和宣传宋庆龄的重地。上海宋庆龄研究会容纳了很多的专家,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所以研究宋庆龄重点是在你们这里。

研究孙中山,现在当然是广东贡献比较大,因为有孙中山基金会、中山市孙中山研究院。中山大学有孙中山研究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有孙中山研究机构,有钱也有较多研究人员,研究孙中山当然有许多有利条件。特别是广东省中山市是孙中山的故里,正因为是孙中山的故乡,华侨、华人,很多爱国者改革开放后都回来投资,中山市富起来了。中山市发展很快,变化很大,改革开放前,中山还是很落后的。我们从广州市到中

山,要坐几个小时的车,晚上坐轮船,9点钟上船,要下半夜5点钟才到中山石岐,到了以后也不能下船,天亮了才能下,过去在中山要找个地方开会都找不到。但是现在不同,中山市的现代化建设成就很大,这除了党的正确领导外,与孙中山的作用、孙中山的影响也有关系,当然主要还是依靠改革开放,依靠我们党的正确领导,和中山人民的努力奋斗,所以中山市发展很快很好。

五、如何挖掘孙中山宋庆龄研究选题

有关孙中山宋庆龄研究你们可以做一些什么呢?有关宋庆龄的回忆录,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和上海宋庆龄研究会编过一本《回忆宋庆龄》,这本书很好,但还可以继续做。回忆录就是回忆以前的一些人,跟她一块共事的,一块工作的,她关怀和营救的著名的知识分子,还有她培养过的,如福利会办的学校培养过的那些人,当时他们是什么样,现在怎么样,宋庆龄怎么样培养他们,使他们有今天。另外,她在世界上有很多朋友,有的在她影响下到中国,帮助中国建设,在北京,在上海,办杂志宣传中国。她到过许多国家,你们应该了解,世界其他地方还有什么人跟宋庆龄有关系,如果有且还活着,那么就可以找到他们,访问、做口述历史。口述历史是现在我们研究历史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研究口述历史也要有准备,你要了解什么,要人家回忆宋庆龄的生活、工作,还是她的世界观、人际关系,也要准备,要有个提纲。有的人年纪很大了,你让他讲,他讲了半天就是重复那几句话,别的都讲不了。你要有一个东西问他,或者你打断他的谈话,客气地说:“先生这个不讲了,还有什么你知道的吗?”或提醒他,当时你们与宋庆龄在一起工作时的情况怎么样,怎么决定问题的,宋庆龄当时讲些什么话,这样就完全不一样了。老年人回忆过去往往讲不到重心,讲来讲去就是那几句话。你们访问的人多了,将回忆宋庆龄的文章汇编起来出书,这些都是重要的研究资料,一定要抢救资料,不争取时间做口述史,过几年就没有了,人都走光了,你想找也找不了了。本来对宋庆龄有些事有人很了解的,可是现在你不找他,去世了就成了悬案弄不清了。所以这个工作应该继续做。

结合具体情况,孙中山还有些什么问题可以研究?我认为孙中山与上海就可以做。孙中山有很多事情都是在上海办的,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到南京当临时大总统,他也从

国外先回上海。别人找他当军政府大元帅,他说不要搞军政府,他说军政府的大元帅,在外国不是国家元首,要搞就搞共和国,要总统制,改大元帅为总统,不能搞军政府,这就是在上海决定的。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比如《建国方略》就是在上海撰写的,南下护法也是在这里决定的,孙中山与国共合作,与李大钊、越飞的谈判,发源地都是上海。研究孙中山这类问题,可大可小,如果材料多就写详细一点,没有很多材料就写简单一点。

比如说孙中山与上海的《民国日报》。《民国日报》是国民党的机关报,每天发表他的活动和讲话。我们编《孙中山年谱长编》时,就详细地翻阅《民国日报》。他对办好《民国日报》是有指示的,像日报的副刊《政治评论》,就可以写一篇文章了。许多重大决定孙中山是在上海作出的,孙中山在上海还接待过许多外文报纸记者的采访,都可以研究。

还有孙中山与中国社会党、孙中山与社会主义,都是1911年在上海这个地方谈的。当时孙中山见江亢虎,跟江说他从国外带了很多社会主义书回来,他要给江,让江组织人把这些书翻译出来宣传,他建议江再组建研究院进行社会主义研究。后来孙中山到南京去当临时大总统了,他托人把这个书亲自送到江亢虎那里去。上海图书馆有关于孙中山、江亢虎和社会党的许多材料。还有《申报》,以及很多外国人办的报纸,外国的记者都在上海。他接见过很多外国的记者,外国报纸报道了不少有关孙中山的文献和活动。你们可以把《申报》,还有其他各种外国人办的报纸上的报道整理成书。

另外孙中山跟鲁迅、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很多人都在上海,他们的关系如何?对重大问题,特别是国共关系、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对世界形势的分析有何不同?把这些问题弄清楚,我看就很有意思。另外他逝世以后,上海人怎么纪念他,怎么缅怀他。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编过一本《近代名人与孙中山故居》,我觉得很好,还可以写孙中山在上海故居如何与名人交往,思维转变一下,就有大把东西可以做。

宋庆龄在上海也可以研究。比如说上海的文化对宋庆龄成长的影响,她的父亲、母亲对宋庆龄的培育。你看宋美龄的文章,她讲父亲讲得很少,讲母亲讲得多,讲母亲怎么影响她。那么宋庆龄和父亲、母亲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父母亲当然很关心她了,如果不是从小送她到教会学校里面去学外语,送到美国去留学,她也不可能有后来的成就。不管她自在不自在,她的父母亲对她的培养都是下了心思的,贡献很大的,这个可以